

厚采论丛

(双月刊)

1981年第6期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

- 通向四化的道路 匡亚明 (3)
- 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精髓 滕云起 (7)
- 试论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 王 灿 (15)
- 重视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
..... 冯 年 (19)
- 理论·实践·探索 乐秀良 (23)
-
- 论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安排的原理 佐 牧 (25)
- 谈谈国民经济结构及其调整 龚海渠 (30)
- 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搞好经济调整 毛系奎 (34)
- 浅谈专业化协作所需的市场条件 夏云林 (38)
- 也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问题 李建松 (40)
-
- 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定义质疑 卢冀宁 (43)
- 论偶然性的原理和作用 孙纪成 王之璋 (49)
-
- 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李良瑜 (53)
- 浅议当代帝国主义的两个问题 程极明 (58)
- 远东慕尼黑真相 祖庆年 (64)
-
- 记陈廷焯《云韶集》稿本 屈兴国 (69)
- 汤显祖和《金瓶梅》 徐朔方 (76)
- 李白从谏是出于个人野心么?(来稿综述) (79)
- 试评几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徐瑞嶽 (80)
- 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茅盾作品和茅盾研究论著述评
..... 叶子铭 卜合士 (84)
- 重温鲁迅的“拿来主义” 文 达 (89)
-
-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成就概述 来新夏 (92)
- 略论张纶对江淮地区水利事业的贡献 魏采苹 (98)
- 浅论“三权分立” 瞿季木 (100)
-
- 南京地下斗争十年(下) 朱启奎 (106)
- 我是怎样研治语言学的?(治学经验谈三) 殷孟伦 (113)
- 希望“治学经验谈”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读者来信)
..... 郑思平 洪 海 (119)
- ✓陈翰笙——我尊敬的长辈、同志和朋友 胡其安 (120)
- 《群众论丛》1981年总目录 (126)

陈翰笙——我尊敬的长辈、同志和朋友

胡其安



在国外出版的国际名人录里，人们不难找到经济史学家陈翰笙的名字；但我却是在一个颇不寻常的环境里和他第一次见面。

1968年1月，正当史无前例的灾难吞噬着中国大地的日子，我忽然变成了“隔离审查”对象，进了座落在北京东交民巷（反帝路）一座带有喷泉的法国式建筑的地下室。当我被送进一间大约十多平方米、放着两张床铺的阴暗的屋子时，发现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身穿中国式棉袄的年约七十岁的老人。我们互通姓名，才知道他就是陈翰笙。在年龄上，我们大约存在着四分之一世纪的差距，我自然地称呼他为翰老。对于我们当时的离奇的遭遇，他诙谐地说，这叫作“在劫难逃”啊！

在那些不寻常的、谁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日日夜夜，翰老安之若素。他每天很早起床，换下睡衣，十分认真地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枕下；又把床铺理得整整齐齐，尔后，就象一座雕塑一样端坐在椅子上。几天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不同的地方。临别，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注意身体。他

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势是长不了的，要想到我们将来还要为党工作！”

说来凑巧，1971年9月下旬，我作为“五七战士”从湖南回北京探亲。那天去机关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叛逃事件的传达，在东四路口和翰老邂逅相遇。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象小学生背诵历史年代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说，他已在某年某月某日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看他那副憨然可掬的神态，那双仍然带着稚气的眼睛，那股似乎要去拥抱全世界的劲头，哪里象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当他知道我也得到“解放”时，简直雀跃起来，一定要让我到他家去吃饭。从此，他就成为我尊敬的长辈、同志和朋友。在十年交往中，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魅力和品格。

1925年翰老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参加革命，先在第三国际工作，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坚持革命斗争，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不追求名利，不搞特权，勤奋不息地工作着。

1971年他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托人带口信劝他退休（他那时已七十四岁）。他内心很不平静，连夜给总理写信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退休，我要求扑在办公桌上死去。”

如今，他已是八十四岁的高龄，双目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书写作都有困难，但仍然把心扑在工作上。他目前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农业经济、南亚和社会科学情报等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和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是一个不知道休息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青年循循善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象磁石一般吸引着从北京、从全国各地和从海外专程来访的人们。他象一团火在放射着光和热，无数的中年人、青年人从他那里得到教益，吸取力量。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来到东华门大街那所古老的北京式大院，翰老曾在这里度过二十几个春秋。可是数月不见，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大院里他的邻居们的住房早已拆除一空，在一片废墟中，翰老住的几间平房孑然而立，看去颇象是一场战乱之后的劫余景象。我走进那间大约十四平方米的工作室，他正在和两个中年人谈话。由于他的视力很差，我向他报了姓名。他说我事先未给他打电话，而他正在工作，所以只好让我在紧连着工作室的一个套间，也就是他的卧室里等待。我从他们谈话里，知道翰老正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们一道审定书稿。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编辑同志谈稿，并不时打断他们，发表他对某段、甚至某个句子的修改意见。他是那样地认真，有时竟和编辑争执起来。我轻声地对翰老身边的素雅（翰老的胞妹，自从他的老伴去世后，她一直在身边照顾他）说，翰老偌大年纪，还象年轻人一样工作，应该适当减少他的工作量才好。素雅说：“我的哥哥哪里肯休息，他逢人就风趣地说他今年才二十八岁哩！”

我顺手看了翰老 1981 年以来的每周活动日程，并从中随便抽出一张。这是 1981 年 2 月 15 日至 21 日一周间的日程表。他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不是参加会议，就是接待来访者。这些来客大多是请教关于学习、教学、科研、出版或者其他工作上的问题。每星期只有两个晚上不接待来访者，这是他个人阅读和处理来往信函的时间。

1981 2月 15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8:00	9: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10:00	10: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16日	9:00 陈鹤年	1:3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17日	8: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18日	8: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19日	9: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20日	8:00 陈鹤年	1:3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21日	8:00 陈鹤年	2:00 陈鹤年	7:00 陈鹤年

陈翰笙先生自订日程表

继承民族的丰富遗产。少年的翰笙在老师循循善诱下，懂得了许多道理。他认识到如果国家不富强起来，个人是不会有前途的，光讲修身又有什么用处？有一次，熊老师在课堂上讲曾国藩的卖国行径，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翰笙情不自禁地在课桌上画了一个人和一把刀，意思是要杀曾国藩。

1914年，他在明德中学毕业。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走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去听美国科学家罗伯逊博士的演讲。这位美国人提倡青年人学科学，并介绍美国植物学家布尔班博士培养无核蜜橘（华侨称之为“金山橙”）成功的例子。翰笙听了以后，便一心想到美国去跟那位植物学家学习，而他的父亲则坚持要他投考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翰笙心想，再过四年，那位老植物学家可能已不在人间了。时间不等人，他以拒绝吃饭的办法来表示他的决心。五天以后，母亲当卖了首饰，凑足一笔旅费供他出国。

1915年夏，十八岁的翰笙从上海乘坐两千吨级的美国邮船“上海号”横越太平洋，进了麻萨诸塞州的一所补习学校半工半读。除了上课外，每天要做工四个小

少年时代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2月5日，陈翰笙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八个兄弟当中，翰笙属长，他在六岁时就学于当地的东林小学。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明末东林党人顾炎武创办的东林书院。学校里有位教修身课的老师黄淡如，对这个接受启蒙的小学生有很大的影响。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介绍历史上卓越人物的事迹，鞭策学生努力进行个人修养，还告诫他们珍惜时间，不要上茶馆，因为“闲谈误事”。幼年的翰笙便立志要做一个“好人”，要写一本关于修身的教科书。

他十二岁那一年，随父亲到湖南长沙，上了私立明德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历史老师傅熊湘（君剑）。傅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他在课堂上讲述太平天国，讲述清政府在外侵略者面前如何丧权辱国，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祖国的历史文化，

美之欧行

傅

中国

时,主要是给校园除草,当木工,给人洗衣服或在学生食堂帮厨等等。

次年,他考入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纳大学。在这所大学学完一年植物学后,发现这一专业对他不合适,第二学年他就改学地质。在学年终了时,任课的教授认为翰笙的眼力不行,所以野外考察所绘制的地图都不准确,建议他改学其他专业。翰老风趣地对我说,“看来我的眼病是有历史根源的。”

进入第三年,他接受了一位丹麦籍教授的建议,改学历史。欧美历史是主修课,同时选修德文和法文。1920年他以全班第二名毕业于波莫纳大学,并获得金质学位奖章。在波莫纳,开始也是靠半工半读维持学费和生活费。当时利用寒假或暑假,在餐馆劳动一个半月所得的小费,就足够半年的费用。不过他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就得到学校的奖学金。三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学生的文学团体并被选为学生会会刊《学生生活》的主编。

波莫纳大学毕业后,他又进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在麦克劳夫林教授指导下,学美国宪政史一年,并以《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为题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这时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开始关心俄国问题,并学习了俄文。以后又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攻读西欧史一年(1921—1922)。

1921年7月,他和顾淑型女士在美国西雅图结婚,次年同去欧洲,在柏林大学随奥托·赫区教授研究东欧史。1924年以一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为题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学习历史科学,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从学习中,他深感一个国家的兴衰有它的内外因素。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才能找出救国之道。自此,他就从寻求个人的出路走向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

投身革命

1924年夏,他从欧洲回国,在北京大学讲授欧美通史、美国宪法史和欧美史学史。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每月工资只能领到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所以他不得不同时在女师大、北师大和燕京大学兼课。当时国家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夕,局势动荡,各种思潮泛滥。青年人忧心于国家安危、民族前途,哪里有心听课?他在课堂上讲美国历史,满以为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谁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思想上很苦闷。就在这时候,认识了北京俄专的苏联教师葛林涅维奇,

从他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经常交谈到深夜。经过这位苏联朋友的介绍,他又和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经济参赞康托诺维奇相识,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后来,通过于德德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开始攻读《资本论》和关于十月革命的一些著作,思想上豁然开朗。翰老深有感触地说,“我学了这么多年的历史,却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学了马克思主义,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马克思早已阐明了这些规律,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1925年是他生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走出了书斋,投身中国革命。当时北京地区的革命运动,是在李的领导下进行的,李又通过郭隆真指导北大师生的革命斗争。在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镇压工人运动的“五卅”惨案后,翰笙被派到上海去运动当时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罢工,在上海和陈云同志首次见面。1926年初,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电邀他去武汉外交部担任顾问,他到任十天后,又接到李大钊同志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北京。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段祺瑞控制下的卫兵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前向赤手空拳的请愿学生开枪,陈翰笙和李大钊同志都是现场的目击者。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杀害。在白色恐怖下,翰笙和他的妻子被迫出走天津,由大沽口秘密乘船到日本神户转往苏联,在莫斯科担任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调查

1928年春,他由苏联回国。先是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不久以后,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担任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直到1934年年初。

这时期,为了研究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城乡经济的影响,他主持过上海日本纱厂包身制的调查,还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安徽二十里堡和广东境内的二十四个县进行农村调查。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王寅生、刘端生、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擢方、张锡昌等同志。他们研究旧中国农村的土地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以及各类农户的生产情况,同时还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烟草区和广东蚕桑区的调查,弄清了旧中国农村经济作物的特点,说明帝国主义势力如何渗入中国农村,对农

民进行直接剥削的问题，从而揭示和论证了旧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特点。1940年，他还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在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傣族土地制度的调查，获得了可以说明原始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同志在1933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

流亡海外

陈翰笙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933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因参加该盟的活动，遭到

国民党特务的杀害，反动势力猖獗一时，迫使他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春，他偕夫人同往日本，在东京利用东洋文库丰富的藏书，研究中国经济史。1935年4月，原先约好第三国际一位同志在东京某地见面，但此人一直未出现。翰笙心想，准是出了什么纰漏；于是，他只身回上海。在从神户驶往上海的客船上，他看到上海外侨办的《字林西报》刊载某西人被捕的消息，而此人正是原来安排和他在东京碰头的人。他知道情况不妙，船到上海后，特地在新亚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写上自己的姓名，来吸引特务的注意。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那里落脚，而是匆匆赶到法租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的住所。史沫特莱要他立即躲藏起来，因为国民党特务正在到处搜捕他。当时路易·艾黎和一英国工程师同住一栋房子，不招人注意，史沫特莱便把他送到艾黎那里住下，同时设法通知顾淑型从日本回上海，和翰笙秘密乘一条苏联船去海参威，这一切都是由史沫特莱精心和巧妙安排的。为了防备国民党便衣搜查，他们夫妇上船后就被反锁在船长专用的卫生间里，一直到船驶离吴淞口，才得以自由行动。

在莫斯科，他担任东方劳动大学访问教授一年。1936年5月，又应美国太平洋学会之聘，第二次赴美，在纽约任该会主编的《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历时三年。

1939年5月，他在党的指示下回到香港，和国际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担任该会秘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向国外进步团体和个人募捐了两千多万元的捐款和物资，支援我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他还主编英文半月

刊《中国通讯》，这个刊物最先报导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全世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香港，他转移到广西桂林，主持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出版《中国工业》月刊，推动了大后方的工业合作运动。这一时期，他还积极从事国际宣传活动，并兼任桂林师范学院西语系主任和西南商业专科学校教授，讲授经济地理。1945年春，重庆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密电桂林，要逮捕陈翰笙。他和顾淑型同志仓促逃亡到昆明，在英领事馆协助下，乘飞机到加尔各答，在印度德里大学任评卷员，并参加全印史学会的活动。旅印期间，他特别关心印度农民的生活和土地问题，访问了印度南方和北方一些有代表性的农村，结识了有丰富实际知识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活动，记录在他后来所著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一书的脚注里。这些简明扼要的记录，表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迅速掌握环境特征的特殊才能。

1946年，他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之聘，第三次访美，担任该校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在讲课之余，他还付出极大的精力研究了卷帙浩繁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和其他有关资料，按五项标准划分了二十一个经济区域，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一书的英文稿。这一研究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我国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不久前，我从翰老那里看到从国外寄来的该书英文本的清样，新德里的联合出版社即将在年内分上下两卷出版该书的英文原本。

建国后

1950年底，他得到党的指示，和他爱人一道离美，经由欧洲回国，于

1951年初到达北京。宋庆龄同志特在她当时南小街寓所请周总理和他吃饭，总理在席间建议他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他欣然应命。这一年四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陈翰笙夫妇。总理对翰笙说，“你在国外多年，熟悉国际上的情况，是否一面办杂志，一面到外交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总理：“吃中餐用筷子，吃西餐用刀叉。我是一双筷子，不要把我当刀叉来使。”总理哈哈大笑。陆定一同志要他到北大去当副校长，协助马寅初校长工作，他又婉言谢绝。当时周总理兼外交部长，聘他为外交部顾问兼外交协会副会长。在这以后，他担任过中印友好协会

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因受诬陷而被关进“牛棚”达一年零四个月。1969年12月，又被送到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1971年7月1日，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终于回到北京。

哺育青年

那是“四人帮”肆虐的年代，翰老只能赋闲在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目睹国家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受到摧残，一代青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真是忧心如焚。他决心为青年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便义务为青年人辅导英语和德语。东华门大街的住所成了临时课堂，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班分别授课，好学的青年陆续登门求教。当“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翰老家里学生盈门，书声琅琅。不久，刘少奇同志的两个女儿也来要求入学。当时，接受这两个孩子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好心的朋友劝翰老找个借口谢绝她们。翰老生气了，他说，“即使刘少奇有问题，但他的子女是无罪的啊！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搞封建株连那一套！”他毅然把她们接受下来。在1973—1978年前后，受到翰老教育的许多青年学生中，有不少是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孩子，这样做的确是需要有些勇气的。

在“四害”横行时，他还排除各种障碍，在几位同志的帮助下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为探讨历史上我国人民在国际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这部《汇编》已由中华书局分册出版。

丧偶之痛

今天人们走进翰老的书房，引人注目的是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幅油画——他的老伴顾淑型同志的遗容栩栩如生，她的一双明亮的眼睛安详地凝视着她和翰老共同生活过的屋子。

1919年，二十二岁的陈翰笙在加利福尼亚的暑期学校第一次见到他未来的妻子，他们同龄又同乡。顾淑型1917年赴美，在加州大学教育系学习。当时顾在一家食品罐头厂勤工俭学，翰老深情地回忆起每当节假日她带些水果给他吃的情景。1921年底，他们在美国西雅图结婚。“从那以后”，翰老回顾说，“我们一直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危险关头，她总是挺身而出，掩护我度过难关。”但在“史无前例”的时

代，翰老失去自由，他的老伴卧病在床，临终时竟未被允许见一面，对他来说，诚然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恨事。

顾淑型是一位热心于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妇女。1924年她从欧洲回到祖国后，在北京创办了艺文中学（今中山公园西侧的第28中学），她任校长。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她自愿去上海和翰笙一道协助宋庆龄同志从事募集捐款、救护伤病员的工作。1936—39年间，她曾在纽约研究电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苏友协副秘书长，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片社主任等职，1968年11月5日不幸病逝。她和翰老所学的专业不同，兴趣也不完全一样。但两人相互关怀，感情弥笃。1962年，他们同游富春江，面对江南秀丽多姿的山水，顾淑型曾希望身后要把遗骨撒在美丽的富春江。她病逝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翰老一直未能按照她的遗愿办事。一直到他结束了干校生活后的1972年1月29日，75岁的翰老在他胞妹的陪伴下，带着亡妻的遗骨凄然来到富春江畔，实践了她生前的约言。翰老踟躇江畔，哀思象富春江的流水一样绵绵不尽。回北京后，一位画家替他画了一幅富春江的风景画，翰老在画上亲笔题辞，并写了一首七绝：

浩荡窄溪送骨灰，凄凄水上我徘徊；

何时物化应做伴，携手夜台笑语陪。

情真意挚的诗句，催人泪下。据素雅告诉我，翰老在每年11月5日都要绝食一天，以寄托对亡妻的哀思。

乐于助人

翰老不但政治上是是非分明，而且生活上戒奢从俭，这两者在他身上相辅相成。他不吸烟、不饮酒也不喝茶，住的是几间陈旧的小平房，冬天没有暖气设备，靠一个带烟筒的蜂窝煤炉取暖。他的房子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写字台是从信托行买的旧货，一张双人沙发已经摇摇晃晃，再就是供客人坐的几把旧藤椅，新增加的两把电镀折叠椅，恐怕要算是他家仅有的“时髦”家具了。他穿的一件花呢大衣还是三十年代在美国买的，里子早已破了，但他不肯做新的；晾在竹竿上的内衣内裤上面有着一块一块的补钉；穿在身上的一件棉袄，前襟内里已破得象蜘蛛网，却仍舍不得扔掉。

他公私分明，办理私事，包括去医院看病，都不坐公家的车子。两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家书店里碰

到他,买完书后,他和我一道挤电车,在车上他还主动给抱孩子的母亲让座。他从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写私信,有的青年这样做了,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他来往信件很多,把旧信封翻拆过来,又重新糊好,这就是他给别人写信经常使用的信封,而他给青年复信回答问题时,却常常用挂号信寄走,唯恐他们收不到。有一次,一家出版社给他送去一笔稿费,他拒不接受,并对人说道,“你们如能不断改进工作,就是对我的最大报酬!”

他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早餐后立即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十时。每参加一次会议,他都在事先亲自写一个发言要点,放在上衣口袋内。用他的话说,这叫做“备忘”。任何人给他去信提出问题,他总要亲笔作复,尽管他的视力减退,写字已十分困难。他的时间抓得很紧,在来访者的两次约会之间,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隙,他也用来做点事情,比如给人复信,或者是给某人打个电话等等。

人们禁不住要说,这样一位老党员,早就可以退休以娱晚年了,而他却自觉自愿地给自己安排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日程,真是难以思议!我问翰老:“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抽象的生活哲学,我的信条就是帮助别人。我乐于助人,这在我是一种习惯!”

那末这种习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这一生得到老师、同学和同志的许多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他也就没有今天。翰老说,在旧社会,他曾经三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祖国旅居海外。几次脱险,都是靠朋友和同志的帮助。在学习和其他方面得到别人的帮助就更不待说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可以算作他的第二信条。他一生中,凡是力所不能及的事,坚决不做;凡是能够胜任的事,则一定要把它做好。他说,他既不懂得工程技术,又不善于行政管理,所能做的只是帮助青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在科学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在学术上,陈翰老不只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而且在世界史、国际关系诸领域都有广博的知识。他治学的态度谨严,不掌握大量资料,不经缜密的分析研究,决不轻下结论。他已出版的主要著作如《人类的故事》(1925年)、《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1930年)、《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1933年)、《中国南方土地问题》(1936年)、《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6年)、《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0年)等数十种,大多写于解放以前,其中有些著作被译成日文、德文。

我同陈翰老十年来的交往中,在各方面都得到不少教益,他是我的良师和益友。每当我看到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以他有限的余年,忘我地为人民工作,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也从中默默地受到鼓舞与鞭策。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但愿我们国家会出现更多象翰老这样的“脊梁”!

